

##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

王卫东<sup>1</sup>, 白云丽<sup>2</sup>, 罗仁福<sup>3</sup>, 张林秀<sup>2</sup>

(1.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2.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3.北京大学 现代农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基于中国农村发展调查(CRDS)数据,运用无序响应模型探讨教育对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教育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并抑制向下流动与传承;教育在促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方面的作用随着出生年份组的后延而变小;增加任何阶段的教育年限,对促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抑制代际职业向下流动和平行流动均具有显著作用;高等教育对促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作用最大,且这种作用不随出生年份组的后延而下降,高中教育的作用次之,但其对 1985 年以后出生的劳动力的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作用明显降低。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提升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增加农村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

**关键词:** 职业代际流动; 教育; 社会公平; 农村劳动力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BLX20194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333012)

**作者简介:** 王卫东(1992—),男,河南开封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农村劳动力就业研究; 通讯作者: 白云丽(1985—),女,山西吕梁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人力资本、劳动力就业及土地产权研究; 罗仁福(1972—),男,江西乐安人,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教育卫生和农村发展研究; 张林秀(1962—),女,江苏溧阳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贫困与农村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20)05-0037-08

收稿日期: 2019-08-03

DOI:10.15931/j.cnki.1006-1096.20200724.008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社会阶层固化问题(陈琳等,2012; 边燕杰等,2014)。许多研究表明,社会流动性不足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Corak,2013; Chetty et al,201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李实等,2011; 李实等,2018)。因此,研究中国社会流动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职业代际流动是指子代劳动力职业阶层相对于父代职业阶层的变化情况,它是反映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重要且稳定的指标(吕姝仪等,2015; Reddy,2015)。代际职业流动渠道不通畅,会直接影响代际收入流动,进而阻碍收入差距的缩小,不利于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蔡洪斌,2011)。

教育被赋予改变个人命运及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使命。已有研究表明,提高受教育程度对促进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生产部门转移有积极影响(Zhang et al,2002; Wang et al,2019)。然而,近年来,“读书无用论”在农村逐渐兴起。这是否因为社会阶层固化,教育无法在职业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进而抑制了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采用近期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户数据,探讨教育在农村劳动力职业流动中的作用,并探究其时间变化趋势,为判断当前社会流动性并为政府和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供依据。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采用近期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户数据探讨了教育在职业代际流动中扮演的角色,并分析其作用的时间趋势,进一步拓展了教育作用的外延。第二,本研究发现教育对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为判断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第三,本研究进一步将教育阶段进行细分,探究各阶段教育对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的作用,发现不同阶段教育对促进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一结论为理清农村教育投资重点提供了依据。

## 一、文献回顾

国外一些研究分析了父辈与子辈职业的代际传承情况。Corak 等(1998)对父代与子代被同一雇主雇用的现象进行探析,发现加拿大约有6%的青年男性曾在他们父辈工作过的单位工作。Ahsan 等(2017)基于印度数据的研究认为,相比于贸易自由化程度低的地区而言,在贸易自由化程度高的地区,子辈拥有比父辈更高等级职业的可能性较大。也有研究从职业代际传承的形成原因入手,探究职业代际流动的内在机制。Rozenzweige 等(1985)发现农业知识和技能的高度专业化、父辈与子辈之间农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承,使得农民的子辈在农业部门工作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Lentz 等(1990)从父母对子女进行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解释了专业化程度高的职业在代际间传承的现象。Lindquist 等(2015)采用瑞典数据的研究认为,如果父母是企业家,其孩子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会提高60%。也有研究认为企业家父母可能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发挥了示范效应。首先,父母增加了孩子在职业选择方面成为企业家的意识或者塑造了他们的价值观,孩子在协助父辈经营的过程中更可能学会专业化的技能。其次,个体也可能继承了父母建立的较为完备的有利于自身经营工商业的社会网络(Dunn et al 2000)。

国外研究对职业代际流动的趋势进行了比较。Featherman 等(1978)采用美国1962年和1973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美国职业代际流动性在增强。Breen 等(2004)基于以色列的调查数据发现,以色列的社会流动性并未因为工业化的开展而发生改变。Reddy(2015)采用印度1983—2012年的数据发现,印度近30年的职业流动性在下降。Long 等(2013)比较了英国和美国1850年以来职业代际流动的情况,发现19世纪美国家庭的职业代际流动性要高于英国,但20世纪以后美国职业代际流动性不及英国。Caparros(2016)对西班牙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进行了研究,发现1969—1986年间的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性要低于1968年以前,并且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职业代际流动差异较大。

国内对职业代际传承的研究还不多。郭丛斌等(2004)运用2000年中国城镇家庭住户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子承父业的可能性较高。孙凤(2006)、朱诗娥等(2018)采用中国城镇数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吴晓刚(2007)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家庭有很高的职业代际传承性。吕姝仪等(2015)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加快了社会流动性,且对男性大学毕业生的职业代际流动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女性没有显著影响。Emran 等(2015)发现1988—2002年间中国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性在不断增强。

国内也有研究在关注职业代际传承的同时,探索了教育在其中的作用。邢春冰(2006)研究了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传递,认为户主与子辈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相关系数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变小,且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教育投资来传递。李力行等(2014)基于多期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中的城市样本,发现职业代际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并发现父亲的教育水平会影响这种代际相关性。周兴等(2015)基于2006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并发现教育在促进职业向上流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二、理论假设

个体的职业层次较之于父辈,存在向上流动、平行流动及向下流动三种状态。当个体希望突破父辈所处的职业层次时,往往面临着一系列的约束。首先,父母的就业状态对个体而言是一种熟悉的就业状态。个体在技能、社会网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子女需要打破这种束缚方可突破父辈所处的职业层次。其次,非父辈所处职业的就业信息对个体而言是相对较难获取的,需要有较高信息搜寻能力的个体才能获得相应的就业信息。最后,个体可能在找工作阶段及就业初期面临被歧视的风险。当然,如果个体选择停留在与父辈相同的职业层次,其面临的外部约束会相对较小,但与那些从事父辈类似职业的个体相比,他们更缺乏相关经验,个体的自身优势能否弥补其劣势有待考量。如果个体优势弥补不了自身劣势,那么个体职业层次较之于父辈将可能处于向下流动的状态。此外,个体就业还面临着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变化等外部约束。

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李宏彬等2008)。个体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着掌握了更多的知识与技能,同时也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知识学习以及技能增长能够使劳动力更好地突破在职业向上流动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约束。比如,知识储备更多、学习能力更强、眼界更加开阔的个体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就业信息,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得更加自信。同时,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个体的工作搜寻成本,使个

体更易于融入并适应新的工作与生活环境(Welch,1970)。此外,教育通常反映的是个体能力,雇主常常依据个人学历信息来判断个体的劳动生产率(Spence,1973),进一步筛选需要的雇员,这也让学历较高的个体有更多机会获得更高层次的职位,从而打破职业的代际传承。

我国经济社会正在快速变化,劳动力市场也在不断完善。对于不同年份出生的劳动力而言,教育发挥其在职业代际流动方面的作用也面临着不同的外部环境。同时,已有研究表明,不同阶段的教育对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收入提升等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De Brauw et al 2008; Wang et al 2019),即不同阶段教育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非均匀同质。因此,有理由认为不同阶段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教育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抑制向下流动与平行流动。

假设 2:教育对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在不同出生年份组的劳动力间存在差异。

假设 3:不同阶段教育对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存在差异。

###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计量模型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农村发展调查(CRDS)数据库。该调查自2005年以来共计开展了6轮,其中2016年收集了家庭三代人口的就业史信息。该调查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国有代表性地抽取了5个省25个县50个乡镇100个村的共计2000户农户<sup>①</sup>。调查收集的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包括家庭关系、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毕业年份;更重要的是,该调查收集了家庭成员自1998年以来的职业信息。通过匹配父代与子代的信息,保留那些同时具备父代职业、个体性别、出生年份、教育程度、子代初次就业职业等信息的样本,同时剔除子代职业为军人及学生的样本,最终保留2503对匹配样本。样本数据表明子代2015年的年龄介于16~42周岁之间。

依据2015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李春玲(2005)、叶静怡等(2014)的研究,本文对劳动力从事的职业阶层按照职业声望由高到低进行排序,依次为高级管理者(党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等)、办事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工作人员(自营工商业以及批发零售人员)、服务人员、工人以及农业劳动者。

#### (二) 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职业代际流动。通过比较子代初次就业时的职业阶层与其父代当时的职业阶层确定取值:-1代表向下流动,即子代初次就业的职业阶层比父代当时的职业阶层更低;0代表平行流动,即子代初次就业的职业阶层和父代当时的职业阶层相同;1代表向上流动,即子代初次就业的职业阶层高于父代当时的职业阶层。

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子代教育程度变量,共有两种测度方式:第一,子代接受过的正规教育的年限;第二,按照教育阶段进行测度,分别是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和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阶段。为了更好地识别每一教育阶段增加1年教育对职业流动的影响,本研究对教育阶段的划分可以理解为各教育阶段的受教育年数相加等于总受教育年数<sup>②</sup>,如某人接受了13年教育,那么在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和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阶段的教育年限分别为9年、3年、1年。

本研究通过增加教育与个体出生年份组虚拟变量,探究职业代际流动的时间趋势。若个体出生在1985年以后,则出生年份组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此外,本研究还控制了子代性别、子代初次就业时父代所从事的职业阶层以及省份虚拟变量。变量定义及描述见表1。

#### (三) 计量模型

本研究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来分析父代与子代之间的职业流动。个体*i*的职业阶层相对于父代职业阶层的变化*j*[包括向下流动(-1)、平行流动(0)、向上流动(1)]的概率为:

$$P_{ij} = P(Y_i = j) = \frac{\exp(x_i' \beta_j)}{\sum_{j=-1}^1 \exp(x_i' \beta_j)} \quad \text{其中 } j = -1, 0, 1 \quad (1)$$

鉴于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非线性特征,对通过模型估计得到的系数不能直接进行解释,因此,本文按

照以下公式进一步计算了各变量的边际效应:

$$\frac{\partial P_{ij}}{\partial x_i} = P_{ij} [\beta_j - \sum_{k=0}^j P_{ik} \beta_k] \quad (2)$$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职业代际流动	1=向上流动; 0=平行流动; -1=向下流动	0.39	0.76	-1	1
正规教育年限	年	11.02	3.27	1	22
出生组	1985 年以后=1; 1985 年及以前=0	0.77	0.42	0	1
子女初次就业时父代的职业	7=高级管理者; 6=专业技术人员; 5=办事人员; 4=商业工作人员; 3=服务人员; 2=工人; 1=农业劳动者	2.14	1.46	1	7
性别	1=男; 0=女	0.54	0.50	0	1
四川省	1=是; 0=否	0.17	0.38	0	1
陕西省	1=是; 0=否	0.26	0.44	0	1
吉林省	1=是; 0=否	0.16	0.36	0	1
河北省	1=是; 0=否	0.24	0.43	0	1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职业代际流动的描述统计分析

如表 2 所示, 农村子代与父代职业分布的统计结果表明, 子女初次就业时的职业与父代当时的职业高度相关, 这种相关性在 1985 年以后出生的子代劳动力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表 2 中国农村父代与子代职业阶层分布统计(%)

子女初次就业时的职业	子女初次就业时父代的职业							合计
	农业工作者	工人	服务人员	商业工作人员	办事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管理者	
1985 年及以前出生								
农业工作者	18.1	28.4	24.4	4.7	2.0	20.4	2.0	100
工人	5.0	29.8	25.6	8.3	6.6	14.9	9.9	100
服务人员	2.0	29.4	27.5	7.8	2.0	21.6	9.8	100
商业工作人员	5.3	23.7	13.2	18.4	2.6	23.7	13.2	100
办事人员	11.1	11.1	16.7	5.6	0.0	33.3	22.2	100
专业技术人员	4.4	13.0	13.0	4.4	4.4	43.5	17.4	100
高级管理者	6.3	6.3	6.3	12.5	6.3	50.0	12.5	100
1985 年以后出生								
农业工作者	22.2	28.0	32.2	2.9	1.2	11.5	1.9	100
工人	10.3	40.0	29.4	3.8	3.0	11.1	2.4	100
服务人员	10.1	31.7	39.7	3.1	1.8	12.3	1.3	100
商业工作人员	6.0	29.5	26.5	12.1	4.8	18.1	3.0	100
办事人员	16.7	23.3	21.7	6.7	5.0	18.3	8.3	100
专业技术人员	6.3	20.8	27.1	6.3	4.2	27.1	8.3	100
高级管理者	19.4	19.4	16.7	5.6	0.0	19.4	19.4	100

1985 年及以前出生的子代劳动力初次就业时父代职业阶层为农业工作者的, 有 18.1% 处于相同职业阶层; 子代职业与父代职业阶层均为工人或均为服务人员的比例分别高达 29.8% 和 27.5%; 随着父代职业阶层的提升, 子代初次就业的职业阶层也以更高的比例处于更高的职业阶层, 如当父代职业阶层分别为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員时, 分别有 60.9%、62.5% 的子代初次就业职业阶层处于专业技术人员及以上; 这说明父代的职业影响着子代初次就业时的职业。对 1985 年以后出生的子代劳动力而言, 职业向上流动似乎变得更加困难。当子代初次就业时父代职业阶层为农业工作者时, 有 22.2% 的子代劳动力处于相同的职业阶层, 这一比例比 1985 年及以前出生的子代劳动力高出 4.1%; 子代初次就业职业与父代职业阶层均为工人或均为服务人员的比例分别高达 40.0% 和 39.7%, 这些比例均比 1985 年及以前出生的子代劳动力高出 10%; 当父代职业阶层为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員时, 分别有 35.4% 及 38.8% 的子代初次就业职业阶层处于专业技术人

员及以上,这一比例远低于1985年及以前出生的劳动力。

表3揭示了不同出生组、不同教育程度的子代劳动力初次就业时,其职业阶层相对于父代职业阶层的流动状况。结果显示,子代受教育水平越高,其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然而,在任何一个教育阶段,1985年以后出生的子代劳动力职业向上流动的比例均低于1985年及以前出生的子代劳动力。

表3 不同教育程度子代劳动力相对于父代职业阶层的流动分布(%)

子代受教育层次	向下流动	平行流动	向上流动	合计
1985年及以前出生				
初中及以下	13.6	31.8	54.6	100
高中	13.4	21.7	65.0	100
大专及以上	9.5	10.1	80.4	100
1985年以后出生				
初中及以下	19.9	33.2	46.9	100
高中	19.4	29.4	51.2	100
大专及以上	14.2	14.9	71.0	100

对1985年及以前出生的子代劳动力而言,随着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在提高。初中及以下教育层次子代劳动力职业向上流动的比例为54.6%,而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子代劳动力职业向上流动的比例高达80.4%。同时,子代教育水平的提高对职业的传承与向下流动均有抑制作用。伴随着子代受教育程度从小学提升至高等教育阶段,职业向下及平行流动的比例分别下降到9.5%和10.1%。对1985年以后出生的子代劳动力而言,随着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职业流动的趋势与1985年及以前出生的劳动力保持一致,但向上流动的比例有所下降,向下及平行流动的比例有所提升。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义务教育的推行、高中教育阶段入学率的大幅提升及高校扩招,高中教育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的稀缺程度在降低;同时,尽管农村劳动力教育年限得到了延长,但他们接受的各阶段教育的质量仍有待提升。

## (二) 教育对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

表4的结果表明,教育对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有促进作用,并会抑制代际职业向下流动及平行流动;同时,教育对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时间趋势。

第(1)列、第(2)列和第(3)列结果表明,增加1年教育能够使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增加7.8%,向下流动及平行流动的可能性分别下降2.6%与5.2%。另外,1985年后出生的劳动力比之前出生的劳动力实现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降低7.4%。子代初次就业时父代的职业层次越高,子代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低,更可能实现职业的平行流动和向下流动。当子代为男性时,其代际职业阶层更可能平行流动及向下流动,而子代为女性的时候,其代际职业更可能实现向上流动。

表4 教育对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边际效应)

	向下流动 (1)	平行流动 (2)	向上流动 (3)	向下流动 (4)	平行流动 (5)	向上流动 (6)
受教育水平(年)	-0.026*** (0.002)	-0.052*** (0.004)	0.078*** (0.005)	-0.036*** (0.004)	-0.070*** (0.009)	0.105*** (0.010)
受教育水平×出生组				0.011** (0.004)	0.021** (0.010)	-0.032*** (0.011)
出生组(1985年以后=1; 1985年及以前=0)	0.039*** (0.011)	0.034 (0.027)	-0.074** (0.029)	-0.099 (0.084)	-0.184 (0.114)	0.283** (0.115)
初次就业时父代职业	0.107*** (0.008)	0.141*** (0.013)	-0.249*** (0.014)	0.107*** (0.008)	0.146*** (0.013)	-0.253*** (0.015)
性别(男=1)	0.001 (0.010)	0.067*** (0.022)	-0.068*** (0.024)	0.002 (0.010)	0.067*** (0.022)	-0.069*** (0.024)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503	2503	2503	2503	2503	2503

注:\*\*\*、\*\*、\*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通过加入出生年份组与教育年限的交叉项来分析子代教育对职业代际流动影响的时间趋势,结果表明,

相对于 1985 年及以前出生的子代劳动力,1985 年以后出生的子代劳动力,增加 1 年教育带来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降低了 3.2%,而向下流动及平行流动的可能性分别上升了 1.1%与 2.1%。上述结果与描述性分析的结果相吻合。

### (三) 不同阶段教育对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

尽管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职业向上流动具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随着出生年份组的后延而减弱。因此,有必要细致探究不同阶段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及变化。表 5 回归结果显示,不同阶段教育的作用存在差异,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对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最大,高中阶段教育的作用相对较弱,且随出生年份组的后延在减弱。

表 5 不同阶段教育对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边际效应)

变量	向下流动	平行流动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平行流动	向上流动
	(1)	(2)	(3)	(4)	(5)	(6)
初中及以下(年)	-0.012** (0.005)	-0.038*** (0.011)	0.050*** (0.013)	-0.003 (0.027)	0.000 (0.058)	0.003 (0.065)
高中(含中专)(年)	-0.022*** (0.004)	-0.028*** (0.010)	0.050*** (0.010)	-0.034*** (0.010)	-0.054*** (0.019)	0.088*** (0.022)
大专及以上学历(年)	-0.039*** (0.005)	-0.090*** (0.011)	0.129*** (0.011)	-0.041*** (0.009)	-0.102*** (0.020)	0.143*** (0.022)
出生组×初中及以下				-0.010 (0.027)	-0.043 (0.059)	0.052 (0.066)
出生组×高中				0.015 (0.011)	0.033 (0.022)	-0.048* (0.025)
出生组×大专及以上学历				0.003 (0.010)	0.014 (0.023)	-0.017 (0.024)
出生组(1985年以后=1)	0.040*** (0.010)	0.042 (0.027)	-0.082*** (0.029)	0.080 (0.120)	0.303 (0.313)	-0.383 (0.346)
初次就业时父代职业	0.108*** (0.008)	0.155*** (0.014)	-0.263*** (0.015)	0.108*** (0.008)	0.158*** (0.014)	-0.265*** (0.015)
性别(男=1)	-0.001 (0.010)	0.063*** (0.022)	-0.062*** (0.024)	-0.000 (0.010)	0.063*** (0.022)	-0.063*** (0.024)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503	2503	2503	2503	2503	2503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具体而言,第(1)列至第(3)列结果表明,大专及以上学历阶段教育每增加 1 年,能够使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提高 12.9%;高中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每增加 1 年,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只提高 5%。在抑制代际职业向下流动方面,大专及以上学历阶段教育的作用也最大。然而,加入不同阶段教育与出生年份组的交叉项后发现,每增加 1 年大专及以上学历阶段教育,子代劳动力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将增加 14.3%;高中教育的促进作用在随着出生年份组的后延而减弱,每增加 1 年教育,1985 年以后出生的劳动力比 1985 年及以前出生的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下降 4.8%;而义务教育阶段的作用对不同的出生年份组而言没有差异。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小学、初中教育已经成为农村新生劳动力必须具备的文化素质,但接受过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仍旧相对缺乏。普通高中和中专是中国高中阶段最主要的教育形式,但其在促进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方面的作用在减弱,这可能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一方面,高中教育对促进农村地区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作用已经不明显,需要继续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另一方面,我们高中阶段教育的导向或者质量可能出了问题,这也在一些研究中被证实(Li et al, 2012; Yi et al, 2015)。因此,不论是国家层面的增加农村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还是家庭层面的增加后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对促进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和实现社会公平均具有重要意义。

##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6 年中国农村发展调查数据,探讨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对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代际职业向上流动至关重要,并且这种作用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具体结论

包括: (1) 教育对促进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有显著作用,并明显抑制了代际职业的传承和向下流动; (2)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随着出生年份组的后延而有所下降; (3) 进一步对教育阶段进行细分,发现增加任何阶段的教育年限,对促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抑制向下流动和平行流动均有显著作用; (4) 高等教育对促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作用最大,且这种作用未随出生年份组的后延而下降;高中教育的作用次之,但其对1985年以后出生的子代劳动力职业向上流动的作用明显降低。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有必要进一步加大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让未来的农村劳动力能够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其次,教育作用的下降(尤其是高中教育)提醒我们需要在不断进行教育扩张的同时,注重提升农村地区教育的质量,特别要关注高中阶段的教育质量。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在加速,人力资本薄弱的农村地区更需要注重教育质量的提升。同时,政府应致力于提供就业信息,减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制度障碍。最后,应进一步增加农村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增加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①抽样方法见张同龙等(2013)。

②方法参见 De Brauw 等(2008)。

#### 参考文献:

- 蔡洪斌.2011.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J].企业观察家(3):58-59.
- 陈琳,袁志刚.2012.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趋势与内在传递机制[J].世界经济(6):115-131.
- 边燕杰,芦强.2014.阶层再生产与代际资源传递[J].人民论坛(2):20-23.
- 李春玲.2005.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社会学研究(2):74-102,244.
- 李宏彬,张俊森.2008.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力行,周广肃.2014.代际传递、社会流动性及其变化趋势:来自收入、职业、教育、政治身份的多角度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5):11-22,156.
- 李实,罗楚亮.2011.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对修正样本结构偏差的尝试[J].经济研究(4):68-79.
- 李实,朱梦冰.2018.中国经济转型4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J].管理世界(12):19-28.
- 吕妹仪,赵忠.2015.高校扩招、职业代际流动与性别差异[J].劳动经济研究(4):52-69.
- 周兴,张鹏.2015.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1):351-372.
- 郭丛斌,丁小浩.2004.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行业代际效应及教育的作用[J].教育研究(1):34-40.
- 孙凤.2006.职业代际流动的对数线性模型[J].统计研究(7):61-65.
- 吴晓刚.2007.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6):38-65,242-243.
- 邢春冰.2006.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有代际流动[J].经济研究(9):103-116.
- 叶静怡,武玲蔚.2014.社会资本与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水平:资源测量与因果识别[J].经济学(季刊)(4):1303-1322.
- 张同龙,张林秀.2013.村委会选举中的村民投票行为、投票过程及其决定因素:基于全国5省100村2000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4):59-68.
- 朱诗娥,唐瑾.2018.我国城镇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兼论同住偏误对其的影响[J].消费经济(6):24-31.
- AHSAN R N, CHATTERJEE A. 2017.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urban Indi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9: 138-152.
- BREEN R, LUIJKX R. 2004. Social mobility in Europe between 1970 and 2000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PARROS R A. 2016.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Spain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92: 94-104.
- CHETTY R, HENDREN N, KLINE P, et al. 2014.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 1553-1623.
- CORAK M. 2013.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 79-102.
- CORAK M, HEISZ A. 1998. The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and income mobility of Canadian men: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income tax data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34(3): 504-533.
- DE BRAUW A, ROZELLE S. 2008. Reconciling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off-farm wage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 [J]. Review

-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12( 1) : 57–71.
- DUNN T , HOLTZ–EAKIN D. 2000. Financial capital , human capital , and the transition to self-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intergenerational links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 18( 2) : 282–305.
- EMRAN S , SUN Y. 2015. Magical transition?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rural China: 1988—2002 [Z].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 No.7316.
- FEATHERMAN D L , HAUSER R M.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ENTZ B F , LABAND D N. 1990.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and occupational inheritance among proprietors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23( 3) : 563–579.
- LI H , LIU P , ZHANG J. 2012. Estimat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using twins in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97( 2) : 494–504.
- LINDQUIST M J , SOL J , VAN PRAAG M. 2015. Why do entrepreneurial parents have entrepreneurial children?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 33( 2) : 269–296.
- LONG J , FERRIE J. 2013.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03( 4) : 1109–1137.
- REDDY A B. 2015.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India: Evidence from national sample surveys , 1983—2012 [J]. World Development , 76: 329–343.
- ROZENZWEIGE M R , WOLPIN K I. 1985. Household structure ,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Farm family land and labor arrangeme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 100( 5) : 961–987.
- SPENCE M.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87: 355–374.
- WELCH F. 1970. Education in produc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78( 1) : 35–59.
- WANG W , DONG Y , LUO R , et al. 2019. Changes in returns to education for off-farm wage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 11( 1) : 2–19.
- YI H , ZHANG L , YAO Y , et al. 2015. Exploring the dropout rates and causes of dropout in upper-secondary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TVET ) schools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 42: 115–123.
- ZHANG L , HUANG J , ROZELLE S. 2002. Employment , emerging labor markets ,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 13( 2) : 313–328.

( 编校: 沈育)

##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Rural China

WANG Weidong<sup>1</sup> , BAI Yunli<sup>2</sup> , LUO Renfu<sup>3</sup> , ZHANG Linxiu<sup>2</sup>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3 ,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101 , China;

3. School of Advanced Agricultural Sciences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within rural China by using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four crucial relationships. Firstly , education promotes upward mobility among rural laborers and reduces both downward mobility and occupational inheritance. Secondly , education becomes less important for promoting upward mobility over time. Thirdly , increasing years of schooling at any educational level will promote the upward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hinder both downward mobility and occupational inheritance. Finally , higher education consistently plays the most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upward mobility regardless of the birth cohorts. However , the influence of high school on upward mobility among individuals born after 1985 is less than that who were born before 1985.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ural education ,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of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for rural residents , and increase the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children to enter tertia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Education; Social Justice; Rural Labor